

论南宋心学家杨简的文学思想

陈 忻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8)

摘 要:南宋心学家杨简把道德伦理赋予人之本心,他以“毋意”即不起意、不动乎意为基础构筑其文学思想:在内容上,文学作品是本心之所发;在表现上,文学作品应以质素为本;在风格上,文学作品应当庄敬中正。杨简把文学与人心直接联系起来,赋予文学庄严的使命。但他把本心善性与文学技巧绝对对立起来,也体现出心学家对文学所持有的偏见。

关键词:杨简;文学思想;本心;质素;庄敬中正

中图分类号:I206.44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9841(2011)06-0171-04

杨简是南宋心学领袖陆九渊的门人“甬上四先生”之一,他继承了陆九渊人心本正本善的思想,“或疑发明本心,陆氏但以为入门,而文元遂以为究竟”^[1]卷74,碧证杨文元公书院记:2479。杨简在陆九渊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“意”的概念,将人心之弊由外在的物欲转换为内在的意识。在杨简看来,“意”是产生“千失万过”的根本原因:“此心本无过,动乎意斯有过。意动于声色,故有过;意动于货利,故有过;意动于物我,故有过。千失万过,皆由意动而生。”^[2]卷2,临安府学记

那么,“意”究竟是指什么呢?杨简说:“何谓意?微起焉皆谓之意,微止焉皆谓之意。意之为状不可胜穷,有利有害、有是有非、有进有退、有虚有实、有多有寡、有散有合、有依有违、有前有后、有上有下、有体有用、有本有末、有此有彼、有动有静、有今有古。若此之类,虽穷日之力,穷年之力,纵说横说,广说备说,不可得而尽。然则心与意奚辨?是二者未始不一,蔽者自不一。一则为心,二则为意;直则为心,支则为意。”^[2]卷3,绝四记 杨简的“意”,“不仅是指‘邪念’之类,而且是指人的本能之外的一切的意识活动”^[3]143,即“任何实际的、具体的知觉、情感等思想意识活动”^[3]141。杨简认为造成我心之蔽的真正根源是意,因为万物本在我心之中,只要不“非裂物我”,物就不会对心产生伤害。这就从物与心的对立中解脱出来,跃过了陆九渊“气有所蒙,物有所蔽,势有所迁,习有所移。往而不返,迷而不解,于是为愚为不肖”^[4]卷19,武陵县学记:238的思想,堵塞了致力于心外求索的可能性。由此引出的以“意”蔽我心取代“物”蔽我心的思想,使其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更加鲜明彻底^[5]159-162。

杨简将道德伦理赋予人之本心,人心本善,不假思索,不劳作为,只要直心而发,其行为无不切当。为此,他提出“毋意”即不起意、不动乎意。当然,“毋意”并不等同于刻意断绝思想:“不动乎意,非木石然也。中正平常正直之心非意也。”^[6]卷18“不起意,非谓都不理事。凡作事只要合理,若起私意则不可。如事亲、从兄、治家、接物,若子哭颜渊恻,与见其过而内自讼,此是云为变化,非起意。”^[2]卷13,家记七可见,这是以伦理道德为基本前提的。

由“毋意”出发,杨简对外索的工夫予以否定。在他看来,致力于外索就是“起意”,而“起意”恰好是

* 收稿日期:2011-05-10

作者简介:陈忻(1963-),女,辽宁沈阳人,文学博士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、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,教授,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。

基金项目: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“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研究”(2010YBRW71),项目负责人:陈忻。

失心失性的根本原因：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习者勉强，本有者奚俟乎习？”^{[2]卷7，家记一}杨简强调本心、要求“毋意”的观点使其心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，也对他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，形成了他别具特色的文学观。

一、从内容上看，文学作品是本心之所发

杨简认为人的本心先天具有万善，“仁义礼知，愚夫愚妇咸有之，悉独圣人有之？人人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，人人皆与天地同”^{[2]卷2，二陆先生祠记}。然而，这万善的本心常常会在后天迷失，需要启复，“仁圣之性，人所同有。昏而蔽之，如丧其灵，如尘积鉴。本明犹在，一日启之，光烛天地”^{[2]卷15，家记九}。对昏蔽之心启而复之，把“人人皆与天地同”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关键就是“毋意”，也就是不能致力于外索的工夫，因为本心之神在于“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力为也”；反之，“辞不胜其繁，事不胜其夥，何以不乱？”^{[2]卷2，著庭记}

昏蔽之心需要启复唤醒，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正是重要的感发方式，“声音之感人也易，其入人心也深”^{[2]卷16，家记十}；“盖声有无形之妙，足以深入乎人心。中正之心，人所自有，惟其无以感之。今中正之音感之于外，则其机自动，其化甚敏，故曰作乐崇德，不惟愚不肖赖乐以感动，而贤智亦以乐养德殷盛也”^{[7]卷7}。关键是什么样的作品、什么样的声音才能感化人心、启复人心善性呢？杨简的回答非常明确，即“良心之所发”：“三百篇或出于贱夫妇人所为，圣人取焉，取其良心之所发也，至于今千载之下取而诵之，犹足以兴起也。”^{[2]卷8，家记二}“学者取三百篇中之诗而歌之咏之，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兴起也。”^{[2]卷1，诗解序}“良心之所发”应当成为作者写作的依归和准则，只有这样才能引导读者进入“无所不通，无所不妙”^{[2]卷3，学者请书}的境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实际的诗文创作中，文学家看重的真情性并不完全等同于“良心之所发”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二者的分离呢？杨简将其归之于起“意”：“使胸中微有意有我，则外物必得以蔽之。惟其无意无我，故虚故明，故不得而蔽，故无所不通。文者自此而发，有自然之文；思者以此而思，有自然之深智。”^{[2]卷8，家记二}

起意有我则心为之蔽。就文学作品来看，只有当作者全身心地投入于本心的抒写，才可以称之为“毋意”。从杨简本人来看，“若夫外盛而内不足，名似而实未有得焉，乃先生之所深戒”^{[8]卷14，乐平县慈湖先生书阁记}。正是在此意义上，杨简坚决反对人们痴迷于作品外在的创作技巧而不问其他：“诗痴正自不烦攻，只为英才辄堕中。今日已成风俗后，后生个个人樊笼。”^{[2]卷6，偶作}

杨简要求作者以自己的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唤醒他人的本心。他对文章与巧言特别作出区分：“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达，始可以言文章；若文士之言，止可谓之巧言，非文章。”^{[2]卷15，家记九}只有“由道心而达”者方可称之为文章，相反，痴迷于巧言的作品难以确保其本心之所在，也就无法承担唤醒人心的重任，杨简要求作者自存本心：“君心自是思无邪，何假于中植奇葩。男儿要当追配古圣贤，岂能更与凡卉争春华。”^{[2]卷6，张时可惠示甲乙稿}他又以韩愈作品为例，对有悖于无邪之思的作品和风俗的弊坏予以严厉批判：“甚至于序送李愿，有曰‘粉白黛绿者，列屋而闲居，妒宠而负恃，争妍而取怜’。此何等法语而敢肆言无忌如是耶？此无他，举天下之风俗皆然，不以为异也。故学者仰韩如太山北斗，心服其文，莫见其过。”^{[2]卷15，家记九}韩愈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用漫画笔调嘲讽追逐功名富贵的官场丑态，对倡导本心的杨简来说，这就违背了无邪的原则，无法感发人们“纯然浑然”^{[2]卷9，家记三}的本心，相反，“盛妆丽色，群目所瞩。少年血气未定之时，风俗久坏，其能寂然不动者有几？至于名卿才士亦沉浸其中，不知愧耻，每每发诸歌咏，举世一律，不以为怪。人心蠹坏，邪僻悖乱，何所不至？”^{[2]卷16，家记十}在杨简看来，这关系到塑造人心的重大问题，所以要坚决予以澄清。

杨简将伦理道德注入到文学中，要求文学成为启复本心的手段，把文学与道德、与社会风气紧密关联起来，对个人的文学情感和表现技巧予以排斥，体现出理学家对感发人心、净化世风的追求，但是，将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其自身的规律对立起来，必然又会对文学自身的抒情写意功能产生负面影响。

二、从表现上看，文学作品应以质素为本

杨简把创作目的限定在感发人心善性之上，当然也就不需要刻意追求文辞的奇巧。然而，现实中的文人却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写作技巧上，“冥心苦思，炼意磨字，为丽服靓妆，为孤峰绝岸，为琼杯玉斝，为大羹元酒”^{[2]卷15，家记九}，这是杨简无法接受的：“后世文士之为辞也异哉，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。曰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；又曰‘惟陈言之务去’。夫言惟其当而已矣，谬用其心，陷溺至此，欲其近道，岂不大难？虽曰无斧凿痕，如大羹元酒，乃巧之极功，心外起意，益深益苦，去道愈远。”^{[2]卷15，家记九}“文士有云：‘惟陈言之务去。’又有云：‘文章切忌随人后。’近世士大夫无不宗主其说，不知几年于兹矣。书曰：‘辞尚体要，不惟好异。商俗靡靡，利口惟贤，余风未殄。’近世王风，好意滋甚，以某言平常，易以他语，及世效之者浸多，则又易之。所务新奇无有穷也，不思乃利口惟贤之俗士大夫，胡为不省，不告诸上而痛革之，乃相与推波助澜。”^{[2]卷15，家记九}杨简以杜甫、韩愈、黄庭坚为例，对刻意追求文辞精工新奇的现象予以否定。杜甫曾诗人自道云：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在杨简看来，文学所承担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感发唤醒人心善性服务，作者只要书写道德本心以达到启诱人心的目的就行了。如果将创作重心偏移到耽迷奇思妙句，结果只能是引人致力外索，昏蔽本心，离道愈远。韩愈主张“词必己出”、“惟陈言之务去”，追求新异不俗，让作品成为“非常物”而“收名也远”，这样的目的与杨简的要求显然南辕北辙。黄庭坚也曾提出“文章最忌随人后”的观点，也是与杨简的要求相反的。按杨简的说法，评价文辞的标准只有一点，即“惟其当而已”，所谓“当”就是实现感发启诱人心善性所需的文辞，“无邪”既是它的起点，也是它的归宿。相反，假如一味追求“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”、“所务新奇无有穷”，这样的作品即使具有精巧新异的外壳，与启复感发人心无关，那就是“心外起意，益深益苦，去道愈远”。杨简说：“不知道者之言，固宜其委曲于意象文义之末，而不悟本有之中也。”^{[2]卷9，家记三}为此，他提出了“辞尚体要，不惟好异”的标准。

杨简对孔子“绘事后素”进行解析，认为“辞尚体要，不惟好异”的具体标准就是“质素为本”的自然天真之美。《论语·八佾》记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？”孔子的回答是“绘事后素”。杨简解析说：“绚，文也。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饰，以质素为文也。孔子于是明质素之为本，而曰‘绘事后素’。”“孔子答以‘绘事后素’者，谓绘画之事后于素功，质素为本也。其旨欲潜消子夏尚文无实之蔽。”^{[2]卷10，家记四}

杨简“质素之美”的真正内涵，并不等同于质木无文，而是不假雕饰、不待外求的自然天成的本色美，真正的奇妙就包蕴在自然平常之中，只有这种最真实的美丽才能唤起人们真正的感动，从而达到“俯仰天然奇，不知手舞蹈与足”^{[2]卷6，内丹歌}的效果。杨简对此反复强调，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方向：“惜也天然一段奇，如何万古罕人知。只今烟水平轩槛，触目无非是孝慈。”“惜也天然一段奇，如何万古罕人知。只今步步云生足，底用思为底用疑。”“惜也天然一段奇，如何万古罕人知。殷勤为语从游子，孰是思为孰是疑。”^{[2]卷6，嘉泰昭阳大渊献筑室董孝君祠之西，下有湖焉……}“妙妙融明乐未央，山川人物献文章。纵横组织无边巧，变化委蛇不可商。”^{[2]卷6，明融}“可惜有生都袞袞，如何终日只纷纷。满前妙景无人识，到处清音独我闻。”^{[2]卷6，偶成}杨简有感于众多作者沉溺于苦思冥想、雕章琢句，对人心人性无所知觉，不能感受大自然的美之所在。他认为大自然的变化本身是美妙无穷的，根本无需苦吟外索，“断无锦向诗中织，但有春从笔底滋”^{[2]卷6，和胡敬院郊台致斋即事新编}，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。

三、从风格上看，文学作品应当庄敬中正

杨简特别关注社会风习与人心纯正的关系，他赞赏唐虞三代的醇厚世风，认为那时“上自朝廷，下达闾里，目之所见，无非中正之色；耳之所听，无非中正之音；身之所履，无非中正之行。无奸声乱色以贼其外，无异端邪说以贼其内，从容乎大道之中，不勉不强，而自有士君子之行。”^{[2]卷8，家记二}杨简认为，有必要营建庄敬中正的社会环境，使身处其间的人们外无“奸声乱色”乱其身，内无“异端邪说”昏其心，始终保持至善的本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文学的职责就是坚持抒写“无邪”之思，以避免“异端邪说”昏蔽人心；风

格上坚持庄敬中正,以兴发人们的本心善性,“使人温良恭敬、中正精粹之德生”^{[2]卷6,心画赋}。

但是,反观当时社会,杨简痛感“后世之风俗不如古也”,人们“终年耳目之所接,心思之所及,非淫声则奸色,非利欲则邪伪,日夜沉浸乎匪僻浮荡之中”^{[2]卷16,家记十},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,一般人很难坚守本心善性。所以,文学必须维护庄敬中正的气象,给予世风良性影响。对此,杨简的观点毫不含糊:“放逸之习不可纵也,庄敬之学不可废也,浮薄之务不可亲也,朴古之事不可厌也。”^{[2]卷15,家记九}

放逸浮薄与庄敬中正、无邪之思背道而驰,这是杨简不能容忍的,因此,他特别强调“无谓诗文之放逸非放于恶也,无谓字画之纵逸非流于不善也”^{[2]卷15,家记九}。将诗文学作品纳入庄敬朴古之途,对人心风俗产生正面影响,是杨简对文学的根本要求,他反复表明自己崇尚三代淳厚古朴之风和庄敬中正之态的立场:“以放逸为奇,以变怪为妙……如妇人焉,清神丽色,雅服妙妆,美则美矣,而非公庭之所当言,非君子之所好乐。施之于晋宋以来则善,施之于三五之上则悖。何者?无淳古质厚之体也,无庄敬中正之容也。”^{[2]卷15,家记九}“随物为形,为圆为方,为正为旁,或直而遂,或曲而疆,或来或往,如飞如翔,如金如缶,如齐如庄。变化万状,众善中藏,粹然之容,烨然之光,其不可穷尽之妙……三代之王、古列圣人典章钟鼎刻画具在,睹之使人温良恭敬中正精粹之德生。”^{[2]卷6,心画赋}

在杨简看来,内在品质的空虚必定使人们醉心于外在的美艳,而追逐外在美艳的结果又会使人们离本心善性愈来愈远。所以,杨简特别重视作者内在的高尚品质对作品的影响,认为作品风格是作者品格的外现,而作品的庄敬中正之风又能够兴起人们的本心。他称赞颜真卿“临大节而不可夺,发诸心画,庄敏肃括。此风可以立懦夫,振叔末”,“可以感动吾民之秉彝”^{[2]卷18,唐颜鲁公祠祝文}。反之,没有“众善中藏”的内质,就不可能有“粹然之容,烨然之光”的外现,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“油然感动于中”的效果。杨简认为,没有庄敬中正的风格,即使“如倾国之色”,也“非君子之所好乐”,乃“君子所不道”。

杨简把文风与人心风俗甚至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,因此,他一再提倡庄敬中正之风,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感化人心,从而起到淳厚世风的作用,这是杨简毕生的追求。

从内容、表现、风格三个方面看杨简的文学主张,其所有论述都是围绕着道德伦理的本心展开的。透过这些文字,可以体会到杨简作为一个心学家关注世风人心的深挚之心。杨简把文学与人心直接联系起来,赋予文学更加庄严的使命,体现出心学家的本色。当然,他把本心善性与文学技巧绝对对立起来,也体现出心学家对文学的偏见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黄宗羲. 宋元学案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2] 杨简. 慈湖遗书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.
- [3] 崔大华. 南宋陆学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4.
- [4] 陆九渊. 陆九渊集[M]. 钟哲,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5] 陈忻. 南宋心学家之“天籁自鸣”说[J]. 西南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2007(2):159-162.
- [6] 杨简. 慈湖诗传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.
- [7] 杨简. 杨氏易传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.
- [8] 袁甫. 蒙斋集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.

责任编辑 韩云波